

简论毛泽东和周恩来

汪 浩

摘 要 毛泽东和周恩来是中国当代革命史上的两大巨人,是中华民族历史银河中一对璀璨的明星。以毛泽东为领袖,毛泽东——周恩来相配搭的领导体制,作为我们党最高领导层的轴心体制,是我们党的历史性选择。

关键词 毛泽东 周恩来 中国共产党

毛泽东和周恩来,中国当代革命史上的两大巨人,中华民族历史银河中一对璀璨的明星,留给炎黄子孙的“恩”“泽”,可与日月争辉,与天地共久。1998年,周恩来诞生100周年,毛泽东诞生105周年。谨以此文诚寄无限的哀思!

—

缅怀毛泽东、周恩来这两位伟大人物,我们自然会联想到,他们的政治生涯,同始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五四”运动,同终于“文革”结束的1976年。他们配搭默契,相得益彰。他们的合作构成了我们党最高领导层的运转轴心,领导我们党长达42年之久,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艰难历程中,发挥了不可替代、不可或缺的关键性作用。“毛周体制”是我们党历史上一个十分突出的历史现象。今天,我们探讨“毛周体制”的形成过程、历史功绩,对于总结党的历史经验,加强党的建设,无疑有着重要的意义。

以毛泽东为领袖,毛泽东——周恩来相配搭的领导体制,作为我们党最高领导层的轴心体制,是我们党的历史性选择。这一领导体制不是自封的、委派的,而是在血与火的残酷的革命拼搏中,在全党包括毛泽东、周恩来本人在内,探索真理,寻找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同时也寻找我们党当之无愧的领袖和领袖人物之间最佳配搭体制的过程中形成的。(关于毛周配搭的我们党最高领导层的轴心体制与党中央集体领导的关系;新民主主义时期,尤其表现在军事领导上,朱德相对于毛周轴心所处的地位和作用;全国解放后至“文革”以前,刘少奇相对于毛周轴心所处的地位和作用等问题,这里暂且不做论述。)“毛周体制”的最终形成、确立和稳定下来,表明我们党真正走过了自己的幼年期。

我们党选择毛泽东作为自己的领袖,是有一个曲折过程的。在建党早期,毛泽东在党内曾多次受排斥,被迫离开中央政治局,失去对中央红军和中央根据地的领导权。这种选择上的失误,在我党及其领袖人物的成长过程中,是难以避免的,这反映了我们党早期在最高领导体制与领袖问题上的幼年性和不成熟性。经过长期斗争实践和反复比较,张闻天在遵义会议后,坚决地转变为拥戴毛泽东,对确立毛泽东的领袖地位,对确立毛周配搭体制,作出了突出的贡献。为共产国际所委派,自称最布尔什维克化的领导班子,以王明——博古为轴心领导体制在国内的实际负责人博古,后来也真正认识到全党应该选择毛泽东,并诚心诚意地拥护毛泽东,在党内多次作现身说法的自我批评,承认自己给党造成了巨大损失。周恩来是较早进入我党最高领导层,并能终身保持在这个位置上唯一的一位领袖人物。他对毛泽东的认识也是有一个过程的。在遵义会议期间,他一方面坚决地批评中央的错误,并勇于承担自己的责任;一方面与张闻天、王稼祥等同志一道,坚决地拥戴毛泽东。遵义会议以后,毛泽东任中央军委主席,周恩来任军委副主席,这标志着我们党以毛泽东为领袖、以毛周配搭体制为最高领导层运转轴心的组织体制的形成和

确立。

同样,我们党的最高领导层形成既有核心,又有运转轴心的组织机制,成为组织严密的领导群体,也经历了曲折的过程。在我们党创建初期,陈独秀虽被推为领袖,也成立了中央机构,但由于当时组织还不严密,力量尚还弱小,斗争环境险恶,相互联络困难等情况,以李大钊、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在北京、上海、湖南、湖北、山东、天津、广州等地开展活动,实际上都在各自为战。加之陈独秀机会主义的发展,我们党并没有形成真正的领导核心。“八·七会议”以后,瞿秋白以文才享誉党内外,他虽然在主观上想尽快摆脱陈独秀的左倾错误,最早表现出对毛泽东“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思想和湖南农民运动的热忱支持,但他同当时我党绝大多数领导人一样,由于对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的理解、认识的简单化,缺乏斗争经验,很快就为新的领导集体所取代。由于时间短,瞿秋白事实上也没有成为我们党的领导核心。我们党形成真正的领导核心是从李立三开始的。为了避免前两任知识分子领导人的弱点,在瞿秋白之后,我们党曾很幼稚地选了一个工人代表向忠发作为名义上的负责人,实权为李立三所操纵,成为事实上的领导核心。有了这个领导核心,立三路线推行较为得力,可惜这是一条错误的路线,其教条主义和盲动主义,导致党的力量的重大损失。以李立三为核心的领导班子的失败,向忠发被捕叛变,为王明宗派团体窃取党的领导权铺平了道路。受命于共产国际,以救世主面目出现的王明,没有严格的程序,没有合法的名义,坐镇莫斯科,通过博古,遥控全党,在我党历史上形成了真正称得上有核心(王明),有轴心(王明——博古),比较严密的最高层领导班子。这是一个以宗派团体为骨干,执行了错误路线的领导班子。由于这个领导班子有共产国际撑腰,加上组织比较严密,骨干比较多,给我党造成的损失更为严重。李立三、王明错误路线给我党造成严重损失,从反面证明了党的最高领导层核心、轴心体制的重要。周恩来逐步发觉了王明的错误,并进行了斗争,特别是第四次反“围剿”失败之后,他与张闻天等逐步转为坚持支持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人这一认识上的飞跃,为奠定毛泽东为核心、毛周为轴心的全党最高层新的领导体制准备了条件。

张闻天为毛泽东在全党领袖地位和毛周领导体制的确立,所作的重大贡献,应予以充分肯定。遵义会议之后,张闻天同志任总书记,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形成了一段时期内的张、毛、周体制,但实际上的核心是毛泽东。这是特殊历史条件下形成的过渡形式。其实,遵义会议之后,不仅全党选择了毛泽东、周恩来,而且张闻天本人也义无反顾地选择了毛、周。但从组织形式上,直到七大,才把毛泽东的领袖地位真正确定下来,才真正确立了毛泽东为核心,以毛周领导体制为运转轴心的我党最高层的领导体制。

建国以后,出于接班的考虑,毛泽东曾先后推举刘少奇、林彪、王洪文等人,意在成为他的继承人。但这些人,都没有动摇毛——周配搭这一基本体制。即使在“文革”期间,周恩来处于极端困难的情况下,林彪、“四人帮”先后从中破坏,但由于全党的拥护,毛泽东同志的坚持,这一领导体制仍然发挥了最基本的稳定和领导全党的作用。

历史选择了毛泽东作为全党领袖,其中既包括全党对他的选择,也包括我们党最高领导层领袖人物之间和毛周之间的相互选择。这一选择过程,是以挫折和失败、鲜血和生命为代价的优化组合过程。

现代管理科学告诉我们,领袖是一个群体。从我们党来说,这个领袖群体,除了毛泽东这个核心之外,在七大之前,还有张闻天、周恩来、朱德、任弼时等;在七大之后,还有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陈云等。但不论前期还是后期,毛泽东与周恩来的配搭,都是这个群体的运转轴心。毛泽东是伟大的战略家,处于领袖群伦的地位,总揽全局,多从哲学上、战略上考虑问题,侧重于决策部署;周恩来是伟大的国务活动家,他处于党和政府“总管家”、总参谋长的地位,多从战术上、操作上考虑,侧重于贯彻实施。以毛泽东为领袖以毛周相配搭作为我们党最高领导层运转轴心的领导体制,领导全党40多年的实践充分证明,这一领导体制,是全党最高领导层领袖人物之间最佳配搭体制。这一领导体制,对于我们党转危为安,并领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发挥了极为重要、不可替代的历史作用。这一领导体制为我们党领导层的长期稳定,为我们党的兴旺发达,作出了无法估量的巨大贡献。毛泽东为领袖、毛周体制作为我们党最高领导层的轴心体制,成为我们党领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诸多条件和因素中最关键的条件和因素。

毛泽东以其深邃的思想,博大精深的理论,高超的战略思想和卓越的斗争艺术,天才的创造性和中

国人的骨气,使全党充满活力;周恩来以其慎密的思路,非凡的组织管理才能,矢志不移的实践和中国人的求实精神,伟大的人格感召力,成为全党稳定的重要因素。一个“活”,一个“稳”,他们的配搭形成了优势互补、相得益彰的最稳定的平衡。周恩来50年代曾与薄一波同志谈论,刘伯承与邓小平之所以能长期配合得很好,是因为刘伯承的特点是“举轻若重”,邓小平的特点是“举重若轻”。其实,毛泽东与周恩来的配搭,也正是这种意义上的优势互补配搭。

关于毛泽东、周恩来40多年的合作在中国革命中的特殊地位和巨大作用,早为世人所瞩目。尼克松在论述这个问题时指出:“毛一个人不可能夺取中国和统治中国。要是没有周的话,毛能不能做到这一点不能下定论。应当记住的重要一点是,他是同周在一起的,是周与毛的合作取得了中国。”在这里,我们且不管尼克松论断是否带有偏见,但他强调了毛周合作在中国革命中的作用,这一点是我们应该认可的。从遵义会议到1976年这40多年中,我们党最高领导层组成成员虽有较大变化,但毛周体制一直没有变,毛泽东、周恩来一直是组成我党最高领导层的基本班底。正是有了这个优势互补、长期稳定、为全党所信赖的“老班底”,我们党最高领导层的整体效益,才能充分发挥出来,我们党作为领导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事业的核心力量的作用才能得到充分的发挥。

二

有人说,“谋事是毛,成事是周”。毛泽东与周恩来,他们之间是不可或缺、相得益彰、密不可分、亲密战友的关系。关于这一点,中央文献研究室金冲及同志有过生动的介绍:毛泽东和周恩来这两个人,的确是不可分离的。小平同志讲过一句很中肯的话:如果没有毛主席,也许我们至今还在黑暗中摸索。对周恩来,我想也可以这么说:如果没有毛泽东,周恩来不会成为今天这样的周恩来。当然从青年时代起,周恩来一直是很杰出的,但真正能使他在一个正确的方向下充分施展才能的,还是因为有了毛泽东的领导。这是事实。而对毛泽东,有如一位中央领导同志所说,最离不开的是周恩来。这也是事实。毛泽东的思想博大精深,有时候不能止于从字面上去理解它。对毛泽东的思想脉络,周恩来十分了解,能够准确把握。同时,对周恩来办事的细致周密,毛泽东也很放心(《望》第42期)。

毛泽东与周恩来,是相得益彰、亲密战友的关系,不是说,他们之间就没有矛盾和不协调。不必讳言,他们之间的不一致、不协调甚至矛盾是客观存在的,大的有四次,两次发生在我党的幼年期。我党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包括周恩来,还没有真正认识到,毛泽东代表着中国革命的正确方向,没有真正认识到应该选择毛泽东作为我党的领导,因此发生了排斥毛泽东同志在红军和中央苏区领导地位的错误。一次是在古田会议之前,一次是在反围剿的过程中。这两次当时周恩来都处于最高领导层的重要岗位,虽然主要责任不应由他承担,但就客观事实来说,正如他自己在遵义会议期间自我批评的那样,也是负有责任的。可贵的是,周恩来和张闻天、王稼祥等同志,能从这两次教训中认识到真理在毛泽东方面。在遵义会议上,义无反顾地全力推举和支持毛泽东,从而开创了“中国革命转危为安”的新阶段,也开创了他们本人在毛泽东的领导下,与毛泽东亲密合作,共同谱写中国革命英雄史诗的伟大人生。另外两次都发生在建国后。遵义会议后的毛泽东与周恩来,特别是抗战初期很少分歧,配合默契,创造了一个个人间奇迹。但建国后,遇到过去没有经历的新问题,他们之间也发生了一些分歧。金冲及同志指出,一次是1956年反“冒进”,南宁会议批周,毛主席讲反冒进是泄了6亿人民的气,犯了政治方向的错误,周总理检讨一次又一次。他的检讨有想不通的地方,因为当时确实发生了冒进,这是事实。但也不能说他完全是违心的,周总理检讨的第一句就是:主席是从战略上看问题的,而我往往从战术上看问题,这是发自内心的。另一次是“文革”,这就更复杂了。“文革”开始时,主席没有告诉他,这是事实,当时他正忙于华北抗旱。不过最初他对“文革”恐怕还是拥护的,只是在方法上,什么人都打倒他不会赞成;还有他当时讲得很多的就是抓生产。其实,许多人在“文革”中被冲击,被专政,最初也还以为“文化大革命”的大方向是对的,后来才慢慢觉得有问题了。大家都有个认识过程,这也包括周恩来在内(《望》第42期)。

关于毛泽东和周恩来,人们不理解的是,毛很信任周,周也明明知道毛很多做法是错误的,为什么不向毛提出,据理力争呢?关于这个问题邓小平、薄一波等老一辈领导人都曾论及过。要理解这个问题,首

先要了解毛泽东晚年特别是“文革”期间，由于林彪、“四人帮”的破坏，“大树特树”“绝对权威”，党内民主和民主集中制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破坏。正如邓小平指出的那样，“当时周恩来所处的地位十分困难，说了好多违心的话，做了好多违心的事。但人民原谅他，因为他不做这些事，不说这些话，他自己也保不住，也不能在其中起中和作用，起减少损失的作用，他保护了相当一批人”。另外，理解这个问题，还涉及如何理解周恩来的问题。金冲及同志在谈到这个问题时举了个例子：1965年，周恩来在审查舞蹈史诗《东方红》时，讲了一段很耐人寻味的话，他说，即使是党的领袖犯了错误，只要没有发展到路线错误，提意见时，也要考虑到方式，考虑到效果，要注意党的团结。当时还没有搞“文革”，也不可能知道后来要发生的事。但这段话反映了周恩来处事方法的特点。从当时的情况看，要周恩来在会议上当场起来反对毛泽东提出的重要意见，他是不会那样做的，那样做也没有效果。一般来说，他有不同意见时更可能的是在会下找毛泽东单独交换意见。现在苦就苦在他单独见毛泽东的次数很多，他的台历上有记载。究竟谈了些什么，谁也不知道（《望》第42期）。不过，在毛泽东周恩来的晚年，周恩来通过单独会见毛泽东来化解他与毛泽东的分歧，可以从邓小平复出，同林彪、“四人帮”的斗争，特别是周恩来带病去湖南会见毛泽东等典型事件上看出端倪。

三

毛周逝世以后，有些人借总结“文革”的经验教训之机，在毛周缺点、错误和毛周关系问题上做起文章来。1978年，大将黄克诚，拍案而起，痛斥全盘否定毛泽东的自由化思潮。其后，邓小平同志在关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著名讲话中指出：“毛泽东同志同任何别的人一样，也有他的缺点和错误。但是，在他的伟大的一生中的这些错误，怎么能够同他对人民的不朽贡献相比呢？在分析他的缺点和错误的时候，我们当然要承认个人的责任，但是更重要的是要分析历史的复杂的背景。只有这样，我们才是公正地、科学地，也就是马克思主义地对待历史，对待历史人物。如果谁在对待这样严肃的问题上离开马克思主义，那末，他就会受到党和群众的责难。”这些当头棒喝，引起了全党警惕，也使一些人收敛了许多。但仍有些人初衷不改，于是乎，另一种错误倾向冒了出来，借颂扬周恩来贬低毛泽东、诋毁毛泽东。1992年，著名影星姜文在美国回答记者采访，一针见血地指出了这种倾向的不得人心。早在毛泽东同志健在的时候，“四人帮”就曾把周恩来放在与毛泽东相对立的位置上，以图打倒周恩来，实现他们篡党夺权的目的。他们以批孔、批儒为号召，蛊惑一部分人。但后来当毛泽东弄清了他们的阴谋时，立即予以严厉痛斥，毛泽东铮铮告诫：“反周民必反”。毛泽东与周恩来这一对亲密战友，一起共事达半个多世纪，相互之间难免有不协调、不一致，甚至矛盾，这是不奇怪的。但他们的友谊却是他们关系的主流，这一点连尼克松的回忆录里也有细致的描述。以周恩来为武器，来诋毁毛泽东，当然比直接攻击毛泽东巧妙，更能迷惑人，但人民不答应。就是周恩来地下有知，也决不会答应。周恩来一生光明磊落，以他为武器，诋毁毛泽东，是对他伟大人格的最大侮辱。遵义会议后，周恩来不遗余力地维护毛泽东的领袖地位，甚至不惜亲身涉险，以维护毛主席的安全。这同某些人扬周抑毛的伎俩一对照，他们藏在阴暗处的鬼影，就暴露无余了。

关于“全党楷模”、“千古一完人”这类的题词，是否含有扬周抑毛之意？我觉得不应这样看，我国的传统是对作古者颂之尤加。周恩来作为“全党楷模”当之无愧；说他是“千古一完人”，比之历史上曾获此美誉的诸葛武侯，有过之而无不及，这里的“一完人”，并不含有排斥他人之意，而是“千古完人之一”的意思，我们断不可牵强附会，乱扣帽子。

对周恩来的评价，无论怎么高，都不为过。但有一条，就是不能把他与毛泽东对立起来，不能扬周抑毛。否则，就必然走向反面。因为那样做，既不符合历史的真实面貌，也非全党全民心愿，其结果必然为全党全民所不齿。

我们不仅要揭露扬周抑毛的诡计还要戳穿借毛泽东之口来诋毁周恩来的不测居心。所谓毛泽东说过周恩来不是帅才云云，不管说得多么有根有据，也不管怎样表白是如何如何的一片好心，都不足以掩盖其恶劣的政治后果，而且以周恩来“举轻若重”，或者以周恩来像诸葛亮为由，下“周恩来不是帅才”的结论，无论如何是难以令人信服的。中国历来有“儒帅”说法，也有不少军事统帅追效儒帅的风度，诸葛亮

就是儒帅的偶像，谁能说诸葛亮不是帅才！以“举轻若重”为周恩来称道的刘伯承，又有谁能说他不是帅才！

同扬周抑毛是“巧妙的蠢事”一样，借毛泽东之口来诋毁周恩来，也逃不出“巧妙的蠢事”同样的下场，正如鲁迅指出的那样：“捣鬼有术，也有效，然而有限，所以以此成大事者，古来无有”。

同毛泽东同志一样，周恩来也有缺点和错误。他自己就曾在遵义会议上作过诚恳的自我批评。相形之下，周恩来比起王明、张国焘等人，表现了超凡脱俗的伟大胸怀。就是对毛主席晚年的错误，虽然周恩来作过不少旁敲侧击的规劝，虽然他同林彪“四人帮”作过坚决的斗争，但应该承认，毛泽东晚年的错误，也有他的份。邓小平同志总结“大跃进”失课时说过，“这个责任不仅仅是毛主席一个人的，我们这些人脑子都发热了”，“但大跃进本身的主要责任还是毛主席的”。我觉得可以用这一原则精神来看待周恩来关于毛主席晚年错误的责任。主要责任是毛主席的，周恩来也应负一定责任。除毛主席外，比起其他人，他的责任要大些。周恩来有缺点错误，无庸讳言，但他同毛泽东一样，对中国革命的卓著功勋，更是光同日月，无可争议！同对待毛泽东一样，我们不能同意以他的缺点和错误，来诋毁他的伟大。有的人以“文革”中他说过违心话，做过违心事，不承认他是伟大人物。对持这种看法的多数人来说，则失之于对伟人的责之过严。如前所说，周恩来的确曾违心地迁就过毛泽东晚年的错误，这是个很复杂的历史问题，是当时特定历史条件的产物，不能简单化，简单化地以此否定周恩来，不可取；否定毛泽东，也不能令人信服。正确的态度是坚持如前所说的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而且应像对待一切历史问题一样，宜粗不宜细，粗一点，宽一点好。

社会主义事业是一项开创性的事业。前辈们的探索，开创了一代伟业，这正是他们的伟大之处。毛泽东及其战友们，其中主要助手是周恩来，成功地领导中国人民，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通过农村包围城市，开创了富有中国特色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宝库。在探索社会主义方面，也不是如某些人所说，没有成功的经验。在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方面，也是富有中国特色的创举。有人说，中国建立社会主义，甚至包括辛亥革命，是否必要，还要怀疑等等，笔者不敢苟同。这是历史的选择，这是中国国情的必然选择，怎是一两个人的主观意志？如果否定了这一条，不仅否定了毛泽东、周恩来，结论必然是否定中国革命，否定我们今天的一切！

毛泽东同志“继续革命”的理论，是关于建设社会主义的探索之一，也是历史的产物，现在看来，这个探索是不成功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是在毛泽东“继续革命”模式行不通，苏联模式（也是一种探索）走向反面，和平和发展成为当今世界两大主题的新形势下，提出并发展起来的，是前人付出学费，我们变得聪明起来的结果。我们不能以后来人的所谓高明，来要求评价前人。牛顿说过他是站在前人肩膀上才显得高大的话。我们不能割断历史，相反，应根据现实的需要，不断总结历史的经验，为我们更加灿烂的明天服务。

我们衷心祝愿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开创的伟大事业繁荣昌盛！

（作者：淮阴师范学院 副教授）

责任编辑 陆军）